

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New Regional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Afro-Asian Arch” and Hollowing-Out Perspectives

Meixi ZHUANG

Abstract: Under globalization, regional concepts and boundaries are continuously reshaped, and traditional nation-state-based geographical definitions are gradually being replaced by more fluid and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perspectives. However, the dominance of Western discourse in shaping regional concept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remains significant, which greatly limits the imagination of other geographical spac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ollowing-out” concept as both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removing or breaking through traditional physical and theoretical boundaries to explore new regional concepts. The paper first critiques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discourse on regional concepts and discusses how the hollowing-out perspective can challenge these established ideas. It then focuses on the Afro-Asian Arch region,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s and non-Western traits of Southeast Asia, Africa, and the Mediterranean as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s commonalities. The hollowing-out approach enables a better grasp of the unique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and provides a practical model for new strategies in a globally diverse cultural environment. This method broadens the scope of regional studies, offering fres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search on regional relations in a globalized context.

Keywords: hollowing-out, Afro-Asian Arch, regional and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innovation in regional concepts

Author: Meixi ZHUANG holds a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is a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Fud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include ideology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critical analysis of Western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er work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journals such a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Jour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China Information*, *Open Times*, *Social Sciences Abroad*, *Modern Communication*, and *China Studies*.

地理邊界的顛覆與重構：“亞非拱門” 與鑿空視角下的地域新解^①

莊梅茜

[摘要]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地域概念和邊界不斷被重塑，原有的以國家為主體的地理界定逐漸被更加流動和多維的空間觀所取代。然而，西方話語體系在塑造地域概念和知識生產方面的主導地位依舊顯著，極大地壓抑和限制了其他地理空間的想像。本文深入分析了作為一種理論和實踐方法的鑿空概念，提倡通過去除或突破傳統物理和理論界限，探索新地域概念的重要性。鑿空這一概念來源於《史記》對張騫開通西域道路的描述，象徵著突破既有物理與理論界限，尋求新的聯結方式。具體而言，本文首先批判了西方話語體系在地域概念構建中的影響，特別是其在地域分區概念以及地理分佈與空間關係概念中的話語主導作用。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探討了鑿空方法在地理學、歷史學及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應用價值，尤其是在非西方國家的區域性研究中，如何突破西方知識體系的桎梏，推動更為多元的地域認知。在分析鑿空概念的過程中，本文聚焦於“亞非拱門”區域，即東南亞、非洲與地中海地區的歷史交織與非西方共性，強調該地區的文化與歷史聯繫遠遠超越了西方主導的區域劃分。本文指出，與西方話語體系相比，鑿空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理解，能夠揭示全球化過程中非西方國家在歷史、政治和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和獨特發展路徑。本文進一步指出，鑿空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在非西方世界的獨特動態，而且提供了一種面對全球多元文化環境的新策略的實際模型。該方法有利於拓展地域研究的視野，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關係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引。通過鑿空方法，我們能夠更深入地理解非西方世界在全球體系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從而推動更為平等和多元的全球知識生產。

[關鍵詞] 鑿空 亞非拱門 區域國別研究 地域概念 創新

[作者簡介] 莊梅茜，澳洲國立大學政治學博士（2018），現任復旦大學政治學系講師。研究領域為意識形態與政治心理學、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基層治理、西方政治與社會理論批判、政治人類學。在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Politics & Society,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Jour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China Information*，以及《開放時代》《國外社會科學》《現代傳播》《中國研究》等國內外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① 本文是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秩序與全球南方創新研究團隊”階段性成果。感謝蘇長和教授、殷之光教授、鄧皓琛博士以及匿名評審對本文的意見與批評。

一、問題的提出

自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提出“世界體系論”以來，地理空間的社會建構性已成為學界共識。但既有研究多聚焦於資本主義空間生產邏輯，鮮有學者系統反思地域概念生成過程中的認知暴力。在此背景下，重審《史記》“鑿空西域”的原始語境具有特殊意義。鑿空的概念源自《史記》中對張騫開通西域道路的描述，象徵著通過打破既有的物理和理論界限，尋求新的連接方式。本文旨在探討鑿空在地域概念顛覆、批判和創新中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應用。本文認為，通過鑿空這一概念，我們不僅可以批判傳統的西方視角地域研究框架，而且可以重新發現和捕捉歷史和文化間的互動，同時揭示這些互動對當代全球化現象的影響。

基於上述背景，本文圍繞以下三個核心問題展開研究：首先，現有的地域概念的知識生產在哪些方面上受到了西方話語體系的影響？其次，鑿空如何在理論層面上挑戰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地域概念？第三，鑿空方法在實際應用中如何揭示非西方地域的共性與內在聯繫，從而促進對複雜歷史和文化互動的深入理解？本文將對西方話語體系下的地理概念進行系統性的批判，在此基礎上介紹鑿空的理論與方法，並嘗試通過聚焦聯結東南亞，非洲和中東的“亞非拱門”地區的歷史聯繫與非西方共性，進一步思考鑿空對於顛覆既有地域概念的重要性，為如何更好地拓展地域研究的視野提供啟示。

二、為何鑿空：西方知識話語體系下的地理概念及其局限性

在社會科學與人文歷史研究中，學者們廣泛採用了一系列地理概念，如地域分區、地理分佈和空間關係等，來探究全球各地不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這些概念大多數源於西方的知識話語體系和地緣政治視角，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文化霸權的塑造下發揮其主導作用的。另一方面，現有的地理概念通常以現代國家為基本單元，強調有形邊界的劃分，注重地理、政治、經濟等要素的靜態分佈，卻忽視了地域間的流動性和相互關聯性。隨著全球化的演變和文化的交融，以西方為中心的地理框架逐漸暴露出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地域分區概念以及地理分佈與空間關係概念上。

（一）地域分區概念

地域分區概念已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基本方式，但其背後的西方中心視角與劃分標準常被忽視。首先，西方社會基於自身利益和視角，將世界劃分為獨立且固定的區域並進行命名。其主要缺陷在於單向性和排他性，過於強調地理界限，進而固化了對各地區的刻板印象，加劇了西方與其他地區的差異與對立。以“東亞”概念為例，它在殖民時代的語境中並非單純的地理名詞，而是在西方殖民主義長期影響下形成的，涵蓋了歷史、地理、文化和政治經濟等多個層面。這一概念不僅是空間上的劃分，更是殖民力量塑造認知的結果。宋念申在《發現東亞》中指出，16世紀地理大發現時期，東亞首次被西方探險家納入世界版圖，地圖製作與描述讓東亞成為西方可認知和控制的對象。殖民框架中的文明等級觀念反映了西方的優越感，並帶有對東亞社會需被改進的偏見。同時，經濟滲透、戰爭和不平等條約將東亞各國納入歐洲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強化了東亞對西方的依賴，並深刻影響外界對該地區的認知。“冷戰”期間，東亞成為西方抗衡共產主義的平臺，進一步在政治層面上重塑國家形象和區域關係。^①葛兆光和李焯然進一步補充了這一觀

① 宋念申：《發現東亞》，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3—25頁。

點，他們強調“東亞”不僅是西方構建的產物，也是多重歷史、文化和政治互動的結果。東部亞洲能成為一個歷史世界，正是因為戰爭、移民和貿易等因素，構成了複雜而緊密的聯繫網絡。^①杜贊奇通過後殖民視角探討了東亞現代性的獨特性，指出其不僅僅是對西方模式的複製，更是本土歷史與西方影響的相互作用。^②一方面，東亞在面對西方主導的地域分區方式時展現出自主的文化和政治反應；另一方面，西方的地域分區標準和敘述方式仍然對東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理解這一過程對於我們重新審視全球秩序和不同區域間的互動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進一步審視可以發現，許多廣泛使用的地域概念並非自然的地理範疇，而是由西方主導的特定歷史事件塑造的地緣政治概念，反映了西方的戰略考量，而非對區域內部複雜聯繫的細緻理解。例如，“東南亞”是在“二戰”期間由西方盟友設立的一個戰略區域。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儘管學術討論中偶有涉及，世界上並沒有廣泛使用“東南亞”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印度支那”“遠東”等名稱。直到1943年，同盟國為了統一對日作戰，成立了“東南亞戰區”，該名稱才開始被廣泛承認。^③諷刺的是，許多未被納入東南亞版圖的區域，如中國的雲南、臺灣和海南，以及印度東北部，實際上在人文地理、歷史文化和生態系統上與東南亞有著密切聯繫。歷史上，這些地區與緬甸、老撾和泰國等國在貿易和文化方面互動頻繁，如滇緬通道和茶馬古道是重要的交流紐帶。^④同樣，印度東北部邦與緬甸和孟加拉有長期的文化聯繫，其民族和語言與東南亞更為接近，而與印度本土認同感較弱。阿薩姆邦的阿洪姆人祖先為13世紀從中國雲南遷徙的傣族，在外貌、飲食、社會結構和文化上都與傣泰民族高度相似。從地理和生態角度看，這些地區與當今東南亞在地貌和氣候方面也有顯著相似之處。^⑤然而，儘管這些區域在歷史、文化和生態方面與東南亞存在諸多關聯，西方主導的地緣政治敘事仍將它們排除在東南亞的版圖之外。^⑥

第二，基於西方社會視角的地域劃分方式往往淡化或忽視那些不符合西方認知的地域特性和歷史文脈。這在地圖繪製中尤為突出。作為地理知識的載體，地圖長期以來被用作權力表達和意識形態傳播的工具。西方製圖者繪製的世界地圖通常以歐洲為中心，放大了歐洲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性。這種視覺扭曲主要源自使用了墨卡托投影法的世界地圖。墨卡托投影是一種圓柱投影方式，尤其適合海洋導航，因為該投影法可以保持方向不變，非常方便航行者使用。但是，墨卡托投影法也有一個重大缺陷，就是對地圖南北的距離會有很大的扭曲，尤其是越靠近極地的地區出現的扭曲越嚴重。這一視角下的世界地圖會導致我們忽視和誤讀一些區域的真實情況，如非洲和南美洲等位置在地圖中往往被縮小，而歐洲和北美的大小在地圖上往往被放大。因此，它在不知不覺中強化了北半球國家的重要性和可見性，削弱了南半球國家的相對地位，使得非西方國家在國際視野中被邊緣化，損害了對這些地區真實情況的認知。

通過地圖，非西方世界還被進一步“殖民化”。歷史上，參與到“地圖殖民”中的不僅是西歐的製圖師，也包括沙俄和蘇聯時代的殖民探險者。著名的西方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和地質學家奧勃魯契夫曾在祁連山地區勘探考察時，用一系列殖民色彩的名稱重新命名了已有名字的山脈湖泊進行地圖繪製，比如將祁連山命名為李希霍芬山，將紮陵湖命名為俄羅斯人湖等。這些名稱

① 葛兆光：《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8頁；李焯然：《中心與邊緣：東亞文明的互動與傳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② P.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③ Emerson, D. K., “‘Southeast Asia’: What’s in a Nam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5, No.1, 1984, pp. 1-21.

④ Giersch, C. P.,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 何平：〈德宏傣族的西遷與印度阿洪姆人的形成〉，《雲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第76-81頁。

⑥ Emerson, “‘Southeast Asia’: What’s in a Name?” p. 11.

被劃入歐洲的一些地圖冊中，給人類認識世界帶來了混亂。西方的製圖師不僅僅是在記錄他們的發現，而是在定義亞洲的身份和界限，這些定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歐洲的世界觀和利益，其影響直至今日。

在地圖與地理知識的製造和傳播中，東亞和歐洲之間實際上存在著重要的互相影響，而這往往容易被忽視。16世紀歐洲傳教士與東亞學者之間的思想交流所引發的關於地理學知識的融合便是一個例證。傳統敘事認為，利瑪竇通過翻譯和改編文藝復興時期的世界地圖，將西方的科學製圖技術帶到東亞。2024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發行的《重新繪製東亞世界地圖：走向“利瑪竇地圖”全球歷史》一書則指出，利瑪竇地圖的製作並非僅由利瑪竇單獨創作，而是經由利瑪竇與中國學者在明朝末期的對話與合作，產生了一系列深受東亞的思想、社會和物質文化影響的地圖製品，包括地圖、地球儀或相關書籍。^①這些地圖製品產生的背後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地理知識的流傳，更是一種知識與知識之間的創新結合，並連接了全球多個學術中心和印刷文化網絡。這些新的史實一方面表明了地圖製作背後的東西方關係不能被簡單化約為對抗或來自任何一方的單方面影響；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地理知識的生產原本就應該是一個充滿全球性聯結且持續演變的多元互動過程；來自不同區域和文化的行動者都被囊括進來，在互相影響對於地域概念形成全面且多視角的融合性敘事。

（二）地理分佈與空間關係概念

地理分佈和空間關係也是以西方的模式產生的，普遍受到西方科學主義話語影響。首先，從植物和動物的地理分佈，到人口、語言、宗教和經濟活動的全球分佈，其背後都貫穿著一種深受西方科學和哲學理論影響的方法論。數百年以來，這種強調控制、比較和對生物和物理現象的統一思考的研究視角在生態學、動物學、植物學等領域形成了重要的理論框架。^②達爾文在探討生物演化學說時，就大量使用了地理分佈的觀念，並引申至物種形成和進化的核心問題。^③然而，地理分佈觀念真正的影響力並不止於生物和自然領域。該概念已廣泛應用於對人口、語言、宗教以及全球經濟活動等社會現象的地理分析中。西方科學理論和哲學方法促使我們對這些現象進行對比和統一的思考，成為了塑造現實世界的一種有力工具。該模式對於動植物、人口、語言、宗教和經濟活動等的地理分佈，都抱持著一種普遍的視角和方法論。其中，植物和動物的生態地理分佈就是很明顯的例子。該模式由馬蒂亞斯·施萊登等西方學者建立，基於對生物和物理現象的比較和歸一化理解（特別是科學主義和唯物主義），試圖通過統一的控制和比較來解釋生物學和物理現象。不可否認的是，科學主義對客觀真理的追求和對自然現象的歸納式分析在許多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然而，科學主義過分強調通過標準化和量化來認識世界，往往會將複雜的地方性知識和文化背景簡化為一組可量化的變數和模型，從而忽視了不同地理區域和文化的複雜性以及個性，並且削弱了地方知識和非西方觀點的價值和影響力。^④綜上所述，在研究全球地理現象和空間分佈時，僅依賴西方的科學主義和唯物主義視角可能無法全面把握複雜的現實情況，因此需要納入多樣化的理論和方法，尤其是來自非西方社會和邊緣群體的視角。

① Cams, M., and E. Papelitzky, eds. *Remapping the World in East Asia: Towar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Ricci Map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4.

② Holt, R. D., "Darwin, Malthus and Movement: A Hidden Assumption in the Demographic Foundations of Evolution," *Israel Journal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 Vol. 55, 2009, pp. 189-198.

③ Endler, J. A., "Problems in Distinguishing Historical from Ecological Factors in Biogeography," *American Zoologist*, Vol 22, Issue 2, 1982, pp. 441-452.

④ Massey, D., *Space, Place, and Gend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空間關係的概念主要用於分析地點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這些地點如何與人類行為和社會結構互動。西方學者長期致力於研究地點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如何影響社會結構和人類行為。自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學者一直試圖通過量化模型和地理資訊系統（GIS）等技術手段來研究空間關係，致力於將其與經濟和政治過程相結合。該方法強調了空間關係的普遍性和可測量性，並在全球化、城市化、區域發展等領域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然而，當該方法試圖通過普遍適用的模型來解釋全球各地的複雜空間關係時，其局限性便暴露出來。首先，西方空間關係理論的一個主要問題在於其普遍化的傾向，即試圖將所有地方的空間關係都納入一個普遍的模型中加以解釋。這一做法忽略了各地文化、歷史、生態和社會背景的獨特性，導致在理解非西方社會的空間關係時常常出現文化錯位。其次，西方的空間關係研究深受“空間決定論”的影響，即認為地理空間結構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①類似的觀點雖然在解釋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展等問題上有一定解釋力，但它往往低估了文化、社會關係和歷史記憶等非物理因素在塑造空間關係中的作用。此外，西方空間關係理論的“全球北方”視角在許多研究中忽略了“全球南方”地區的地方性知識和生態智慧。

然而，更多的現象正在向我們揭示，空間關係的理論並不限於西方文化。對於許多非西方社區和文化，獨特的空間關係理解方式已經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和探索。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時空一體化與空間的時間化已經得到了大量的討論，尤其是非單純線性的時空觀念在傳統的聚落規劃、風水佈局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處理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這些都很难被西方空間關係理論的固定模式所解釋。^②認知人類學研究表明，西太平洋島嶼土著人群的空間認知感和西方人存在很大差異，而這一差異源於他們所處的特殊島嶼環境的塑造。^③然而，這些文化自覺的反思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巨大攻勢面前，顯得單薄無力。

推進更公平的空間關係認知並非一定要依賴於非西方文化範式。郝曉光繪製的豎版世界地圖對打破固有的西方主導的地理敘述頗有助益。該地圖通過重新調整地理呈現方式，避免了傳統地圖中放大西方世界的偏見，幫助人們從更平衡的視角看待全球不同區域的位置與重要性。豎版世界地圖，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將地球表面資訊按照從南到北的垂直視角來展現的世界地圖。橫版地圖通常從西向東展開，中間是0度經線，兩邊是180度經線。而豎版的世界地圖則將南極點作為地圖的下方，北極點作為上方，從南向北展現地理資訊。在豎版世界地圖中，南北美洲會呈現在地圖的一側，而非洲、歐洲、亞洲等大陸則位於另一側。該視角清晰地展示了南北極以及南北經線的佈局，也使得像南極這樣在橫版世界地圖上無法完整呈現的區域可以被完全展示出來。儘管豎版世界地圖與傳統地圖一樣，其本身也面臨比例失衡問題。^④但是，它在視覺上有助於脫離以西方視角為基礎的地圖設計，矯正和顛覆傳統地圖帶來的習慣思維，加深人們對於地理空間、文化、歷史和政治等複雜問題的不同理解。

以上批判性分析引出了一個關於知識產生和制定的更深層次的追問：以地理概念為中心，我

① Soja, E. W.,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② 劉曉峰：〈中國古代時空一體化觀念的形成〉，《現代哲學》，2023年第3期，第124—132頁

③ Shore, B. “A View from the Islands: Spatial Cogni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Ethos*, 42(3), 2014, pp. 376–397.

④ 需要注意的是，豎版地圖本身的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首先，儘管豎版地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地圖中的“上位”與“下位”概念，但它仍然面臨比例失衡的問題。具體而言，豎版地圖在拉伸南北極區域時，可能導致這些地區的實際比例被扭曲，使得某些國家和地區在地圖上顯得過大或過小。這種比例上的失衡與傳統水準地圖中的失衡問題類似，會影響人們對地理空間的準確認知。因此，豎版地圖雖然在視覺上提供了“平等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顛覆傳統地圖帶來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有助於提高對非西方地區的關注，但它並不是一種完美的替代方案。豎版地圖的設計仍然會受到製圖法則和投影方式的限制，無法完全消除地理空間上的比例失衡和視覺偏見。

們不禁追問，是誰決定了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正確的？^①受制于歷史文化的影響，我們對此的理解常常基於西方的視角與知識體系，從而形成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結構，使得西方的理論和觀點成為了所謂的“默認”觀念，而其他的視角和理解被邊緣化。因此，針對以西方為中心的地域概念及其局限性，我們有必要提出新的理論方向和研究方法，以超越這種空間劃分的束縛，開啟對地理空間的深度探索和理解。

三、何為鑿空：理論內涵與方法論

鑿空理論的提出，正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地域概念的挑戰與回應。從理論內涵上看，鑿空通過重新定義地域分區、地理分佈和空間關係。從具體實踐而言，鑿空方法論提出了知識體系的再構建、跨區域與跨學科整合，以及文化多樣性與歷史情景化的比較研究的要求，旨在對全球地域關係提供深層次的認識工具。

（一）鑿空概念的歷史淵源與概念內涵

從歷史淵源來看，鑿空一詞源於《史記》中記載的張騫開通絲綢之路的壯舉，最初指的是打通東西方文化和政治交流的通道。該說法出自《史記·大宛列傳》，于“西北國始通於漢矣”句後寫道：“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②在原本的語境中，鑿空主要與地理上的開拓相聯繫，意味著通過穿越難以逾越的山川和沙漠，開闢出新的道路，使曾經隔絕的區域得以相連和通達。正如張騫通過受命出使打破了漢朝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局限一樣，鑿空在知識生產領域打通了世界的某些未知或封閉的部分，達到了致遠的新境界。在當代的學術討論中，鑿空可以被用來形容通過新的研究或理論突破舊有的界限和偏見，建立新的視角和理解。這反映了一種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尋求通過打破常規來探索和連接不同的知識領域，從而增進對複雜問題的深入理解。具體到人文社會科學中，鑿空強調的是對地域、文化和政治的新認識，挑戰和重構傳統的地理和文化界定，實現思想上的“通道開關”。

就概念意涵而言，鑿空概念在地域分區、地理分佈及空間關係三個方面對西方知識體系下的地理概念進行了深刻的突破與重構。首先，在地域分區概念方面，西方的地域分區往往基於固定的政治和文化邊界。鑿空方法通過打破這些靜態劃分，強調地域間的流動性和互聯性，從而重新定義和連接不同地域。其次，在地理分佈的研究中，西方知識體系傾向於採用統一的科學主義和唯物主義方法。鑿空方法嘗試引入本土知識視角，重新審視地理分佈，強調地方性知識和生態智慧的重要性。第三，在空間關係的分析中，西方中心的地理理論通常依賴定量模型，而鑿空方法則意圖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空間關係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挑戰了空間關係的單一解釋模式。

（二）鑿空的方法論

作為一種涉及地域概念研究的應用方法，鑿空指的是通過去中心化的視角、跨區域和跨學科的整合，以及動態的地域觀，力圖揭示全球地域的複雜性和多元性。首先，從理論建構的角度來說，鑿空不僅是對物理空間的拓展，更是對學術和認知邊界的開拓。它要求我們超越學科和地域的傳統界限，以全新的視角和關係來審視和解構現有的地域概念，乃至重構世界觀。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地域往往被視為文化、歷史和社會交往的綜合產物，而非單純的物理空間。通過鑿

① Rose, G., *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ing with Visual Materials*, London: Sage, 2016.

②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3847頁。

空，我們得以揭示被主流敘事所忽視的地域聯繫和文化互動，如陸地與海洋的聯繫，不同文明之間的聯繫等等。

其次，鑿空的關鍵在於推動知識體系的多元化與去中心化，即在學術研究中納入更多元的視角和聲音，構建真正全球化的知識框架，比如將原本以某一特定地域為中心的視角，轉向其他未曾關注的方向。^①因此，無論是人文還是社科領域的比較研究中，鑿空方法都起著重要的作用。跨區域的文化比較研究可以揭示出文化互動和變遷的內在邏輯，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社會中文化多樣性的形成與發展。鑿空還要求研究者將特定地域的歷史背景與全球化進程聯繫起來，進行歷史情境化分析。

第三，跨學科與跨區域的整合是鑿空方法的應用基礎。不同學科對地域、文化、歷史和社會的理解各有其視角與方法，但傳統學科分割常常導致對複雜現象的碎片化理解。與此同時，區域國別研究的現狀表明，許多學者往往專注於自身研究的區域，缺少跨區域的比較和整合。正如王正緒所指出的，跨區域比較是發現深層次政治結構和歷史邏輯的重要方法。^②通過鑿空，學者能夠突破各自為政的研究模式，將不同區域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對比，從而揭示出區域間的共通性和差異性，進而形成新的理論建構。吳小安同樣指出，在中國區域國別學的背景之下，鑿空意味著打破傳統的地域框架和解釋範式，引入全球視域和跨學科研究的視角，以更加開放和多元的方法來認識和研究中國及其在亞洲和全球的位置和作用。^③

在現有的學術和非學術話語中已有一些體現鑿空意義的地域概念創新。在《亞洲的地中海：13—21世紀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商埠與貿易圈》一書中，弗朗索瓦·吉普魯巧妙地結合了全球海洋歷史研究和亞洲區域經濟研究，提出了“東亞經濟走廊”這一概念，特指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新加坡的海洋區域，以此構建中國、日本和東南亞海洋與港口城市之間的歷史互動。這一概念打破了傳統的陸地為中心的地理觀念，而強調海洋及其貿易對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動態的重大影響，把海洋視為連接各地區的橋樑，而非分隔它們的障礙。^④

我國政府宣導的瀾湄共同體同樣是一個具有鑿空意味的地域概念。首先，儘管瀾湄共同體就性質而言是一種次區域國家間合作機制，但它所涵蓋的地理區域——瀾湄流域——自古以來便是一個超越國家體系的“天然共同體”。區域內的族群、社會和國家在地域和文化層面上緊密相連，長久以來保持著高度的互動與共通性。所謂天然共同體，其基礎在於地緣和血緣，而其維繫則依賴於區域內的頻繁交流，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交互流動，“交流摻雜、你來我去”^⑤。天然共同體的特點在於各方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形塑，超越了人為劃定的邊界，消解了族群、社會和國家的封閉性與緊張感，最終形成了多元共融、一體化的局面。其次，瀾湄共同體通過將中南半島與我國西南地區視作一體，扭轉了過去對於我國西南地區的內陸性的刻板印象。例如，昆明在內地民眾眼中處於邊遠地帶。然而，在瀾湄共同體的視域下，從中南半島的沿海地區向內輻射去審視它，昆明則成為了該區域的核心腹地。實際上，在不少當地人眼中，雲南從不是邊陲地區，而是四通八達，連接內地與南亞和東南亞的地域性樞紐。由此可見，鑿空對於重新思

① 汪暉：〈兩洋之間的文明〉，《經濟導刊》2015年第8期，第10—21頁。

② 王正緒：〈區域國別研究的發展模式、學科視野與研究方法〉，《太平洋學報》2024年第32卷第4期，第1—13頁。

③ 吳小安：〈中國區域國別學：全球視域與亞洲研究脈絡下的理論探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第1—12、241頁。

④ [法] 弗朗索瓦·吉普魯：《亞洲的地中海：13—21世紀中國、日本、東南亞商埠與貿易圈》，龔華燕、龍雪飛譯，廣州：新世紀出版社，2014年。

⑤ 張原：〈“走廊”與“通道”：中國西南區域研究的人類學再構思〉，《民族學刊》2014年第4期，第1—7頁。

考邊疆與中心、內陸與海洋的關係帶來了新的視角，為人類世界觀的重建帶來了契機。

四、“亞非拱門”與鑿空視角下的地域新解

鑿空理論的實踐提醒我們，地域分析不應局限於地圖上的線條和地理邊界，而應超越這些限制，深入挖掘連接不同文化與文明的深層結構和新興聯繫。本文嘗試提出的“亞非拱門”概念，正是對鑿空方法的一種生動應用，通過揭示亞非區域的歷史聯結與相互作用，重新構建了以往被忽視的跨區域關係與深刻的有機連結。

（一）亞非拱門的概念

對於如何理解“亞非拱門”這一突破西方視角的鑿空式理念，我們不妨先從“世界島”概念入手。“世界島”是地緣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地理想象，發明者哈爾福德·麥金德提出，亞、歐、非三大洲在地理上是相連的，尤其是在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前，這一大片陸地被視為世界的核心區域。在這一理論中，麥金德認為世界島的心臟地帶位於從伏爾加河到長江，從喜馬拉雅山脈到北極的廣大內陸區域，掌控這一區域的力量將擁有支配全球的戰略優勢。^①

“世界島”概念對地域創新提出了兩重啟示。第一重啟示借鑒性的：這一理論嘗試通過超越國家和地理劃分的“天然化”來重新構建歐亞非大陸的整體性，展示了通過打破傳統地域劃分來拓展地理想象的可能性。第二重啟示是批判性的：麥金德的“世界島”理論過度強調北方的陸權和內陸的地緣優勢，忽視了歐亞非南方沿海地帶的複雜性和活力。因此，真正的地域創新不應止步於內陸，而應突破陸權論的局限，將視野擴展到歐亞非大陸的沿海區域，探索這些海洋通道對於全球文化、經濟和政治互動的重要意義。



圖1 亞非拱門區域（黑線標記為作者自製）

“亞非拱門”（Asia-Africa Arch）這一概念由國際關係專家蘇長和教授在復旦大學國際秩序與全球南方創新研究團隊2022年的一次討論會中首次提出，是該團隊正在醞釀的一個創新地域概念。顧名思義，亞非拱門指的是由非洲東海岸，中東和印度沿海以及中南半島和海上東南亞的整個西部沿海地區的海岸線所勾連的一個呈“M”字型的拱門狀的區域。這個概念試圖把研究視角從傳統的歐亞視角擴展到包含亞洲和非洲的更大範圍，強調理解和探索這兩個大陸之間的相互影

^① Mackinder, H. J.,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4, 1904, pp.421-437.

響和互動關係，而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亞歐聯接。

在核心意涵上，“亞非拱門”與已有的“環印度洋”和“亞非之海”等地域研究框架存在顯著差異。儘管“環印度洋”概念強調了印度洋沿岸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和政治聯繫，它主要集中於印度洋作為連接這些國家的海洋線路和貿易網絡，通常關注的是印度洋作為歷史上的全球經濟活動中心。相比之下，“亞非拱門”則是一個更為宏觀和全面的地域構想，它不限於印度洋的地理和文化影響範圍，而是拓展到非洲東海岸、中東、印度沿海以及中南半島和海上東南亞的廣闊地帶。其次“亞非拱門”特別強調非洲與亞洲之間的直接聯繫，而不是通過歐洲或其他外部力量的媒介，這一點與“環印度洋”強調的主要是由外部力量如歐洲殖民主義影響的貿易網絡有所不同。

此外，“亞非之海”（Afro-Asian Ocean）的視角側重強調海洋的連接作用，以及海洋空間的聯動構造起的區域秩序。不同的是，亞非拱門的概念強調陸地與海洋的內在聯繫：海洋與陸地的關係體現為一個“交接點”——陸地通過各種文化、經濟與政治的交錯為海洋提供了背後支撐，而海洋則為這些陸上活動提供了流動性、流通性和互動平臺。拱門的“結構”隱喻了陸海結合的深層次互動，表現為跨越地理和文化的聯動機制。因此，亞非拱門提供了一個不同于陸心說的視野，強調從海洋的視角去審視陸地。

從歷史視角來看，亞非拱門在商貿和文化交流上具有深刻的連結性。儘管該區域跨越多個現代國界，其內部連線性的確不如瀾湄共同體或東亞經濟走廊那樣緊密。但是，歷史上該區域存在著更加宏大而深遠的互相影響。在現代地緣政治中，“亞非拱門”這一概念亦有其實際意義。這一區域包括了多個正在迅速發展的經濟體，如東南亞國家和部分非洲國家，這些地區正在通過新的區域合作和南南合作框架加強聯繫，反映了全球經濟重心的東移和南移。此外，這一區域的戰略位置對於理解全球海上安全和貿易路線的重要性具有啟示作用。

下面的分析將圍繞三個主要方面，即非西方的海洋傳統，跨體系、跨陸海的全球化體系特徵與文明國家的形態深入論證歷史上的“亞非拱門”區域所具有的共通性和內在聯繫。

（二）非西方的海洋傳統

亞非拱門呈現的獨特形態會讓人們在第一時間注意到分佈於亞非大陸之間的廣闊海洋航線和貿易網絡。在此背後，蘊含著一種非西方的海洋傳統。相對於西方的殖民主義，東方的海洋傳統更加守成和具有防禦性質，其目標是致力於維護既有的貿易路線和文化聯繫。這些中西方的差異不僅是歷史上的現象，而且影響著當今世界各國在地緣政治、經濟合作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行為和策略。

西方在進入近代後，尤其是到了大航海時代，海上活動的重點轉向了海外探索和殖民化。如霍布森在其著作中所述，西方的海上探險和隨後的殖民擴張，是驅動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構建的重要力量。^①西方國家通過強大的海軍力量以及對遠洋航行技術的精進，建立了覆蓋各大洲的殖民地與貿易網絡，追求的是資源的控制、新市場的開拓以及原料的獲取。這不僅加速了全球化進程，也加劇了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和政治不平等。

在大多數歷史情況下，亞非拱門地區並不是由一個中心化的國家機構來直接控制海洋貿易，也並沒有發展出與本國保持聯繫的殖民地網絡，而是各個自治的港口城市或城邦，通過建設龐大的海上貿易網絡實現相互之間的聯繫。這些網絡往往通過家族、宗教團體、行會和貿易聯盟等非

^① Hobson, J. A.,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J. Nisbet, 1902.

正式結構來維持，體現了一種基於相互利益和共同發展的原則。^①兩者的區別還體現在亞非地區以互聯互通為目的的航行技術和路線選擇上，並在港口城市間形成了具有輻射效應的商貿和文化交流網絡。亞歷山大港在古代就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重要貿易和知識交流中心，而馬六甲更是連接東亞和南亞，乃至歐洲的海運樞紐，是亞非地區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點。^②在非洲東海岸的港口城市，如摩加迪休、馬林迪、桑吉巴和基爾瓦不僅是非洲內部貿易路線的組成部分，也是連接遠距離海上貿易路線的關鍵點，將非洲內陸、中東以及南亞等地的文明和經濟體系串聯起來。^③

在亞非拱門區域，即便是最具競爭衝突色彩與商業氣息的東南亞港口政體，也呈現出一種與西方地中海模式完全不同的海洋傳統。^④海上東南亞的地理構成——大陸與島嶼的分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該地區國家的經濟生產模式和世界觀。大陸地區國家主要依靠農業生產，而島嶼國家則以海洋貿易為生命線，這體現出他們與土地或海洋的緊密聯繫。特別在海洋東南亞，貿易傳統源遠流長，受益於中國宋朝時期向海上貿易的轉型和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海上絲綢之路及其沿岸的海洋東南亞港口城市在當時煥發出了新的活力。港口城市不但是商品集散地，更是文化和資訊交流的重要節點。這些以市場為導向的貿易活動催生了一種新的政治實體——港口政體，其核心不在於國家間的朝貢體制，而在於商業利益的追求。換言之，政權的成立和繁榮主要靠商業利益而非單純的政治統治。^⑤港口城市往往享有相對的自治權，在海上貿易網絡中充當樞紐，而不必像歐洲的商業聯盟那樣直接依賴國家的政治體系。在這些港口政體中，馬來語作為交流的橋樑，凸顯出開放和包容的社會特性。總而言之，港口政體的海洋傳統強調自治與網絡連接，多樣化的貿易實踐，與以國家為中心、擴張主義和殖民主義驅動的中海模式形成鮮明對比。

（三）跨體系、跨陸海的早期全球化經濟體系

亞非拱門區域作為歷史上文明國家和民族國家的交匯點，其歷史早期就體現了後現代全球化的跡象。安德列·古德納·弗蘭克在他的著作中詳盡地探討了亞洲的經濟活力以及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他認為歐洲只是較晚加入一個由亞洲經濟中心早已主導的體系。^⑥沃勒斯坦同樣在他的“世界系統理論”中提及了亞非地區在歷史上作為一個整體經濟結構中的關鍵部分。^⑦根據沃勒斯坦的論述，15世紀之前的世界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非洲和亞洲的某些地區才是世界經濟活動的主導。^⑧

在《歐洲霸權之前》一書中，珍妮特·阿布·勞德進一步探討了中世紀後期亞非地中海區域在全球經濟與政治中心地位的形成與衰落。她強調這一地區由於貿易路線發展、城市化、文化宗教多樣性、貨幣經濟與商業實踐創新以及分散的政治軍事力量等共性，共同構建了一個複雜的且具有高度互聯性的跨體系網絡。亞非地中海地區的諸多社會特徵和動態發展，展示了一個經濟繁榮、技術先進、城市化發達的多極化世界，與處於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歐洲相比較，呈現了顯著

① Reid, A., *The Organis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n Polity*. In F. Broeze (Ed.), *Brides of the Sea: Port Cities of Asi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Vol. 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p. 56-74.

② Reid, A.,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Sheriff, A., *Slaves, Spices, and Ivory in Zanzibar: 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 1770-1873*,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④ Wade, G., "An Early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 900-1300 C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0, No.2, 2009, pp. 221-265.

⑤ Reid, A., *The Organis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n Polity*. In F. Broeze (Ed.), *Brides of the Sea: Port Cities of Asi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Vol. 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p. 56-74.

⑥ Frank, A. G.,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⑦ 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Social Discontinu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⑧ Wallerstein, I.,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New York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的先進性。然而，該體系在面臨地區性疾病、氣候變化和戰爭等挑戰後開始解體，為後續歐洲的興起創造了條件。^①阿布·勞德指出，長期的海陸交易並不單一地依賴於市場力量，而是伴隨著貨幣系統和商務邏輯的共同發展，這些因素合力影響了城市發展和社會結構。^②貨幣在推動貿易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交換媒介的標準化，人們克服了跨地域貿易所面臨的一系列複雜問題；如何評估不同物品的價值，如何促進不同地區之間的平衡交易等等問題，都可以通過統一的貨幣制度來解決。雖然這些地區在自然資源和社會組織上有顯著的差異，但長期以來的經貿關係和文化交流激發了它們在經濟實踐和文化發展上的共同點。

同樣，社會結構在亞非拱門各地通過經濟和文化交流趨向一致，並留下了長久的歷史與社會影響。隨著貿易行業的擴張，商人和水手階級在許多社會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商人與水手通常缺乏政治權力，有時又能產生重大的社會影響。首先，商人和水手不僅帶來了商品，還傳播了技術、宗教和文化實踐，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對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③在印度洋體系的沿海地區，水手和商人還常常與本地婦女通婚，建立跨國家庭並生育混血子女，但是女性很少陪同男性出海。這類港口婚姻的出現一方面促成了港口城市的國際化，同時也對港口城市的人口結構和社會關係造成了實質而持久的歷史後果。^④其中較為著名的例子是華人移民與馬來土著通婚的後裔，即土生華人，又名海峽華人、峇峇娘惹。早期隨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土工、農商和水手，在抵達麻六甲後，為了方便經商，部分人選擇與當地土著女子結婚，稱為“納番妻”。當他們回國時，這些“番妻”則留在當地，負責打理生意。類似的社會與人口特徵在荷蘭殖民時期的巴達維亞^⑤，摩鹿加群島等地也非常普遍^⑥。其次，水手和商人的跨地區聯繫促成了商業實踐的標準化，同時它們的文化實踐和價值觀對各地的社會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例如，伊斯蘭商人網絡，不僅在經濟上，也在宗教和文化上促進了地中海世界到南亞地區的一體化。^⑦跨地域的經濟和文化交流，特別是在貨幣系統和商務邏輯共同發展的背景下，展示了一個多極化世界經濟的雛形，這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後現代全球化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亞非拱門區域作為早期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不僅是地理上的連接點，更是文化、技術和資本的交流樞紐。中國的絲綢和瓷器經由這些城市傳向西方，而中東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則傳入歐洲，影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革命。技術上的交流也是這一區域全球化作用的重要體現。造紙術和火藥的傳播從中國通過中東最終傳入歐洲，極大地影響了全球的科技進步和政治格局的變動。長期的互動與影響在亞非拱門區域造就了諸多“混血”文化，如斯瓦西里文化與馬達加斯加文化。斯瓦希里文化不僅體現了對非洲傳統的傳承，還吸收了來自亞洲和中東的影響，諸如伊斯蘭宗教和阿拉伯建築風格。^⑧“斯瓦希里”的名稱源自阿拉伯語，意為“瀕海地區”。三百餘年前，斯瓦希里便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直到19世紀受到歐洲殖民者影響，才改為拉丁字母拼寫。在阿拉伯文化的影響下，東非城邦史學也得到發展，流傳至今的很多東非城邦的編年史使用了阿

① Abu-Lughod, J. L.,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③ Curtin, P. D., *Economic Change in Precolonial Africa: Senegambia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5.

④ 楊斌：《人海之間：海洋亞洲中的中國與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183—195頁。

⑤ Abeyaskere, S. “Women a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atavia.” In *Women's Work and Women's Roles*, Leonore Manderson, ed.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3.

⑥ Abdurachman, P. R. “‘Niachile Pokaraga’ A Sad Story of a Moluccan Queen,” *Modern Asian Studies* 22:3 (1988), pp. 571-592.

⑦ Ashtor, E.,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Collins, 1976.

⑧ Horton, M., & Middleton, J., *The Swahili: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a Mercantile Society*, Chichester: Wiley, 2000.

拉伯文或是阿拉伯字母拼寫的斯瓦希里語。斯瓦希里語還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語借詞，今天仍被尚比亞、馬拉威、布隆迪、盧旺達、莫桑比克等東非和中非國家的人們所普遍使用。馬達加斯加文化則受到東非與東南亞南島文化的重要影響。馬達加斯加語屬於南島語系，與婆羅洲南部南加里曼丹巴里託河地區的語言非常相似，尤其是與馬安揚語，共用高達90%的詞彙。這一語言關聯主要由於大約1500至2000年前，首批抵達馬達加斯加的人群主要來自婆羅洲。^①這些“混血”文化的存在揭示了海洋在維持和促進不同區域間經濟、文化和知識交流中的樞紐作用。

亞非拱門將沿海地區與其身後廣袤的陸地聯繫起來。在鑿空的視角下，海洋與陸地的關係，不再單純是物理上的分隔或連接，而是一種動態的互動機制，推動了不同區域、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共同發展。海洋為陸地提供了跨越空間的流動性。通過海洋，陸地上的各類活動得以流動與擴展，而這些活動又在文化、政治、宗教等多個層面上與其他地區進行深度的互動與融合。在亞非拱門區域，海洋與陸地之間的緊密聯繫不僅涉及到沿海地區，還顯現出許多內陸城市和地區在區域和全球歷史中的重要性。中東地區的內陸城市如大馬士革、巴格達、安曼等——特別是在伊斯蘭黃金時代——不僅是宗教思想和文化的交匯點，還孕育了眾多重要的學術成果、哲學討論和技術發明。印度次大陸的內陸地區，如德里、印度堡、班加羅爾等城市，也在亞非拱門的框架下具有重要地位。儘管印度的海岸線廣闊，但其商貿網絡向內陸延伸，使得內陸地區長期以來是印度與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東南亞之間貿易與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轉站。在非洲大陸，內陸地區如內羅畢、坎帕拉、哈拉雷等城市，雖然遠離海洋，但能通過鐵路、內陸水路和陸路貿易網絡，與沿海城市如蒙羅維亞、沙蘭港和阿必尚等相連接，形成了橫跨非洲的經濟帶。此外，東南亞的內陸地區，如曼谷、仰光、金邊等內陸城市是連接海上東南亞與南亞、東亞及非洲之間的關鍵節點，尤其在歷史上，孟加拉灣的貿易網絡和“湄公河流域”經濟圈使得這些內陸城市成為文化與商品交換的關鍵場所。從這些內陸城市的視角來看，亞非拱門不僅僅是沿海地區的海洋網絡，而是通過陸地網絡的相互支撐，形成了一種更為立體和綜合的區域互動模式。這種內陸與海洋的互聯關係彰顯了全球南方地區的多維連线性。內陸城市和地區的戰略位置，往往在全球歷史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在推動跨區域經濟合作、文化傳播和政治對話方面。這些地區提供了陸上資源、勞動力和社會組織形式，在整體區域結構中不可或缺。

（四）文明國家的形態

從形態來看，亞非拱門地區的國家有著明顯有別於西歐民族國家的文明國家傳統。歐洲民族國家通常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理論構建的，特別是19世紀和20世紀民族主義興起時期，民族國家的概念得到明確並推動了許多國家的形成。民族國家強調的是一種共同的民族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大多建立於語言、文化、歷史甚至血緣關係上的共同性。文明國家則不必嚴格基於單一民族的身份，而是其文明傳承，包括歷史上的成就、宗教信仰、文化遺產、語言和藝術的集合體。文明國家的認同更為廣泛，不僅僅局限於民族而是一種跨越時空、族群的文化繼承和傳承。

政治上，亞非拱門區域的國家們在構建自己的國家身份時，經常強調文明的延續性而非單一民族的歷史。埃及建國的敘事很大程度上依託古埃及文明的遺產，而非僅僅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②同樣，伊朗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也遠遠超出了其現今的波斯民族身份，而是基於波斯帝國、

① 中國外交部：〈馬達加斯加國家概況〉，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092/1206_678094/，2024年12月20日。

② Reid, D. M., *Whose Pharaohs? Archaeology, Museums, and Egyptian National Identity from Napoleon to World War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薩珊帝國等歷史文明的傳承。無論是在語言、文學、宗教還是藝術方面，波斯文明的影響都深刻地嵌入了現代伊朗的國家身份認同中。在這些國家中，歷史的深度和文明的廣度成為國家認同的核心，而非單一民族的現代國家意識。經濟上，經濟整合對區域文明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如布羅代爾所指出，地中海地區作為亞非拱門一部分，在歷史上曾是相互聯繫的；世界市場和社會構成的經濟系統，對周邊文明有著深遠影響。^①亞非拱門地區的哲學思想發展並非停留在單一的宗教框架內，而是在多種文化、宗教和哲學思想的交匯點上形成了獨特的多樣性。在中東地區，伊斯蘭教與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希臘哲學的結合，催生了豐富的哲學和科學傳統，影響了整個世界的思想發展。印度的佛教與印度教、薩滿教等傳統的交匯，使得印度思想和文化呈現出高度的包容性和多元性。^②因此，亞非拱門地區的文明國家在政治、經濟、宗教和哲學等多個領域展現出與西歐民族國家截然不同的特質。通過跨越民族、文化和地理的互動，亞非拱門形成了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文明網絡，推動了全球南方地區在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深度融合，不僅為世界其他地區的思想和文化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借鑒，也為未來全球性合作和跨文化對話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五、結論

我們生活在一個以西方為主導的知識權力體系下。這個知識權力體系不僅主導著我們如何理解世界，更主導著我們如何看待自己一直以來的存在。正如唐納德·艾默生所言：“一些名字，比如‘玫瑰’，承認的是現實存在的事物。另一些名字，如‘獨角獸’，創造了原本並不存在的東西。在這兩者之間，就是那些既描述又創造現實的名字。”^③這一洞見啟示我們反思那些看似無需置疑、理所當然的地理概念，如“東南亞”“歐洲”“中國”，雖然勾勒了地球上實際存在的區域，但其定義和理解方式卻構成了一種影響人們認知世界的權力話語，隨著傳播和複述，逐漸成為一種文化霸權，影響著人們如何理解世界、構建認知地圖、安排國際事務，甚至進行自我定位。

本文通過對鑿空理論的探討，挑戰和重構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地域概念，強調了重新認識全球地域關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過“亞非拱門”這一案例，本文深入分析了非西方地域的共性和內在聯繫，展示了打破傳統地理框架、構建新型地域概念的可能性。

本文的研究貢獻在於通過對鑿空方法的學理分析及其在“亞非拱門”建構中的應用，展示了打破傳統和既有框架來理解世界的可能性。從西方話語體系的解構到亞非拱門地區新共性的發掘，鑿空為我們揭示了地域關係和文化交融的深層紐帶。這一過程梳理了東西方的互動，提示了後現代世界中存在的新社會文化動態。亞非拱門及其所代表的鑿空式地域創新方法，既是對以歐洲為參照的殖民現代觀的突破，也是對多元現代性的承認。亞非拱門的提出，並非要構建一個新的中心主義，而是致力於在發現共通性的基礎上，尊重不同地域的獨特與多元。鑿空方法論的核心在於打破傳統邊界，推動跨學科和跨區域的合作，深化我們對複雜全球關係的理解。此外，鑿空方法推廣了從多元文化和多中心經濟視角來理解全球歷史和政治經濟的重要性。通過結合地理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的視角和方法，這一方法論不僅增強了對特定區域如亞非拱門內部動態的理解，也促進了對全球化過程中這些區域如何相互作用的深入分析。

① Braudel, 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ia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② Foltz, R., *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Overland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③ Emerson, “‘Southeast Asia’: What’s in a Name?”, p.1.

然而，儘管鑿空在理論和實踐上具有重要意義，其應用仍面臨諸多挑戰。首先，不同地域和學科之間的差異可能導致理論整合的困難，如何在跨學科研究中有效整合定量與定性方法，如何處理不同文化和語言背景下的研究資料等。其次，跨區域研究的複雜性也要求研究者具備更廣泛的學術儲備和跨文化的理解能力。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應鼓勵對跨區域和跨學科研究的探索，借助鑿空這一概念，構建更為全面和多樣化的地域理解框架。這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複雜關係，而且可以為構建一個多元和諧的全球社會提供理論支援和實際指引。通過繼續深入探討“亞非拱門”概念及其在全球語境中的應用，我們有望為未來的地域研究開闢新路徑，推動學術界在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上的進展。

[責任編輯：黃奇琦]